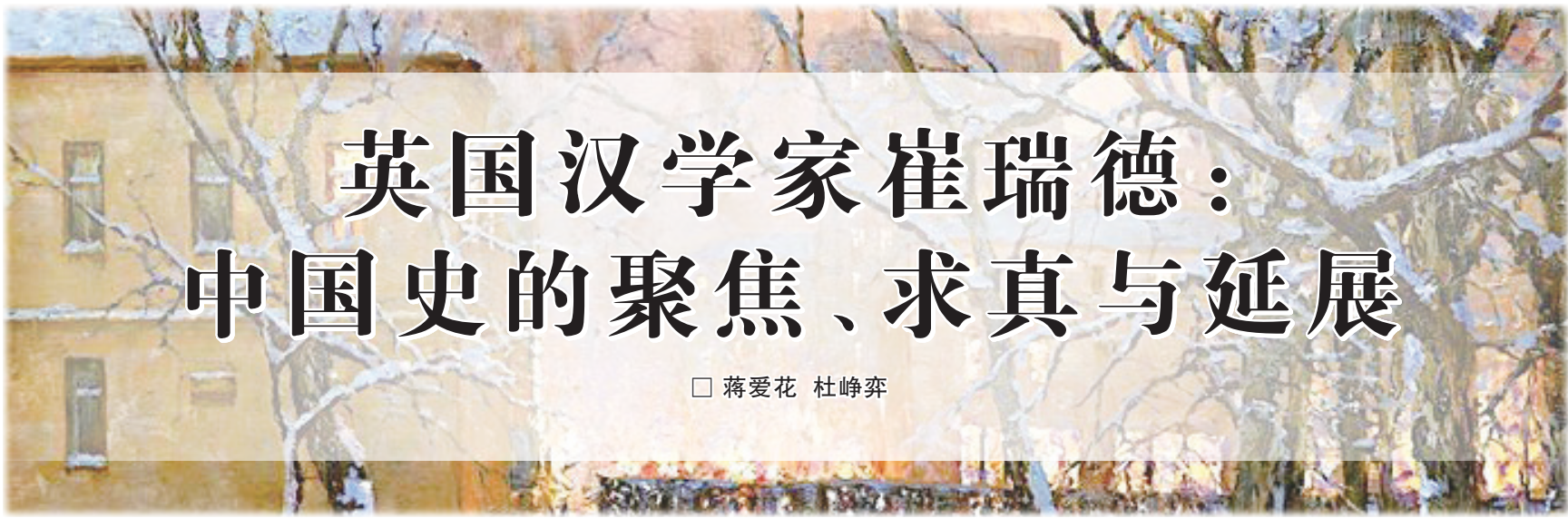




□ 蒋爱花 杜峥弈

英国汉学家崔瑞德：中国史的聚焦、求真与延展

崔瑞德（Denis Twitchett），中文名又译为杜希德、崔维泽，是享誉全球的英国汉学家。崔瑞德最负盛名之处在于与费正清共同编写了《剑桥中国史》，该著作是20世纪西方汉学的最高成就之一。崔瑞德用力颇多，除了担任主编外，还负责多卷本的策划与编写。崔瑞德平日不苟言笑，一如他严谨的学术风格。他总是选取财政、官制、史源、文化特色等十分重大且具有牵动性的议题，并提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评价。西方历史学者将注意力投放在东亚研究上，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崔瑞德的远见卓识。

献身汉学的英国人

崔瑞德行事颇有传奇色彩，从剑桥大学到普林斯顿大学，随他漂洋过海而来的书达数吨之重，不少是装订考究的博士学位论文。这位学术大家授课同样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他讲课材料甚为简略，最多准备一张纸片，上面仅有几行字，其他学者讲课时所用的大纲、阅读书目在他这里全然不见踪影。崔瑞德还习惯边看掌心边讲课，以致学生们怀疑他的大纲誊写在掌心。

二战期间，崔瑞德学习了半年日语，从此与东亚研究结下不解之缘。战后，他入剑桥大学主修汉学，获博士学位。之后他远渡重洋，负笈扶桑，受业于东京大学，在这里，他遇到了中国法制史权威仁井田陞，故其作品《唐代财政》有着极其鲜明的日本考据学风格。崔瑞德曾把《旧唐书·食货志》译成英文，《唐代财政》本是作为前者的英译导读而写就，后来由于种种因素，他只得将《唐代财政》单独付梓，这将二战以来西方汉学界对中国中古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更为重要的是，当大多数欧美学者只能通过近百年来的历史演变来了解中国的时候，崔瑞德已经将研究视野延展至古代，有助于西方更为深入地认知中国历史。

崔瑞德曾执教于伦敦大学、剑桥大学，1967年荣膺英国科学院院士，那时他才42岁，正处于年富力强时期。20世纪70年代，崔瑞德受邀参加《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的策划工作，并单独负责中国方面的内容。这使得该书无论在主题抑或历史角度上，均具有极佳的整体感与连贯性。1980年，在牟复礼盛情相邀下，崔瑞德加盟普林斯顿大学，不久担任“胡应湘汉学”讲座教授。从任教剑桥起，他已是欧洲汉学界最重要的人物，几乎与美国汉学巨擘费正清并驾齐驱。在崔瑞德游走下，1997年西方老牌汉学杂志《泰东》由普林斯顿迁

往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并延续至今，这对海内外的学术交流颇有助益。

崔瑞德长于把握历史的全景，善于把某些细节融入整体，进而勾勒出更高层次的历史画卷。他的研究新见迭出，令人耳目一新。如谈到《贞观政要》所体现的唐代君臣平等议事风格，他认为这体现出游牧民族的习惯；提到范仲淹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时，他认为文句表达具有佛学因素。他的个人素养也对研究产生了影响。崔瑞德不仅是一位历史学家，也有相当高的钢琴造诣，这使他对唐代的音乐颇有心得，《论〈旧唐书·音乐志〉》一文反映出他在音乐方面卓尔不群的修为。

汉学传统的坚守者

崔瑞德对唐代历史情有独钟，尤其是对史料刨根问底的辨别与溯源构成了他的研究特色。他最早发表的论文之一《〈旧唐书·食货志〉文本源流考》便透露出他的研究基调。他追溯史源的方法来自历史悠久的欧洲汉学传统，即自沙畹与伯希和以来，强调用高度批判的眼光看待史料。哪怕正是史这样“正经”的材料，学者也绝不能轻信，而要追根溯源后再作出评估。由他执笔的《剑桥中国隋唐史》导论中，他还特别辟有一节专谈唐代史料问题，指出今人对唐朝的认识基本来自史官的记载，研究唐史必须了解官方的修史过程、方法、意识形态及他们存在的局限，明乎此点，学术研究方能最大程度排除史家成见的干扰，直抵千百年前的唐朝风华。

面对年轻一代历史学家摒弃传统的治学路径，拥护社会科学方法并大举进军传统中国研究的论调时，他挺身而出，为老牌汉学正名。在崔瑞德眼中，西方传统汉学重视文字及解读史料的做法，这与统计学等社会科学的新方法同等重要，不可偏废。他不喜过度强调理论的历史著作。伊懋可于1973年出版《中国历史的模式》一书，书中提出“高水平平衡陷阱”理论用以解释中国发展为何停滞不前。但此时却出现一篇书评，指出了伊懋可在缺乏史料研读的前提下，一味探讨理论的弊端，这鲜明体现了汉学传统中“文章不写半句空”的研究理念，书评的作者正是以治学严谨著称的崔瑞德。

基于对史源的浓厚兴趣及自身强烈的学术责任感，崔瑞德还为唐朝史官柳芳正名，指出其为《旧唐书》所作的重要贡献，最终促成《唐代官修史籍考》一书的面世。直到晚年他在台湾的系列演讲中，仍反复强调唐代史学源流、现代学者如何受到传统史

家影响的问题。

对版本史源的不懈追求激起了他对中国印刷史的兴趣，这便是《中国中古时期的印刷与出版》之由来。该书本是他英国某个印刷协会的演讲稿，后出版成书，内容“涵盖了几乎所有中国印刷史研究中的基本问题”，汇总了海内外的研究成果，对先前中国学者较少留意的史料问题进行了探讨。书中配有崔瑞德亲自挑选的大量精美插图，充分显现了他在中国印刷史和版本知识上的深厚修养。书名虽限定在中古中国，不过书中内容除集于唐宋外，还延伸至清代，旁及朝鲜半岛的印刷业。

崔瑞德研究范围十分广泛，不局限于令他声名大噪的唐史。唐朝前后数百年间的外族统治及明朝历史等皆是他目光所及之处。同时，他还涉足水下考古，如在《沉船遗宝：一艘19世纪沉船上的中国银锭》一文中，他借由沉银视角，将唐宋五代中国与南海沟通网络的形成与运作清晰地展现出来，揭示了丰富的历史意涵。得益于地理学的背景，崔瑞德在研究学时能够从实际出发评估行政制度及管理方式，例如探讨税收时，他将这些体系同所在地域结合起来，对其可行性作出客观评判。

年过耳顺，这位汉学大家仍笔耕不辍，且在选题与创新上愈加纯熟，其中不乏长篇论文佳作，篇幅之长俨然一部小书。如他1996年发表长达102页的《如何当皇帝》论论唐代皇权，并将李世民的《帝范》等为政心得译成了英文，还附有十分详尽的背景论述及相关注释，尽显传统汉学的踏实学风。《唐朝的皇室》揭示了唐朝皇家各种面貌，尤其对皇室职官的分析鞭辟入里。

崔瑞德的朋友圈

崔瑞德师承汉学大家龙彼得，更确切地说，他同龙彼得亦师亦友，情谊甚笃。20世纪欧美汉学界流行从正史中挑选某一“志”进行翻译、注释与阐述，以此为学位论文或研究方向。崔瑞德选择了《旧唐书·食货志》展开自己的博士论文写作。在当时箋注本尚未出现，数字检索更无从谈起的情形下，要翻译正史及考察其文本源流，个中困难可想而知。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龙彼得同他一道读完了《旧唐书·食货志》，二人互相切磋，共同度过了十分惬意的时光。这段美好的经历令崔瑞德难以忘怀，以至近40年后他回忆过往时，还带着感性的笔触追溯曾经的求学生涯。

除龙彼得外，崔瑞德与其他汉学家多有往来。欧洲的西门华德、白乐

日等人都曾与他合作。20世纪60年代离英赴美后，他在美国学界声名鹊起，结识了芮沃寿、芮玛丽夫妇及杨联昇等学者，并与他们建立了密切合作。崔瑞德常提携后进，在剑桥培养出麦大维、杜希桥这样的杰出弟子，他们日后在唐代文史方面成绩斐然。黄仁宇的作品能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也是崔瑞德鼎力相助的结果。《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是黄仁宇研究明朝财政的佳作，但由于审稿人与黄氏理念不同，书稿出版发行陷入僵局。然而，崔瑞德慧眼识才，意识到此书的独到价值，将其收入《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之列，并亲自作序以示支持。尽管崔瑞德声名在外，但他对资历不深的黄仁宇给予了充分尊重，为了让《万历十五年》提早面世，崔瑞德还努力奔走，寻求合适的出版机会。凡此种种均展现了他对于优秀作品的崇尚以及打破陈规的魄力。

赖颐和、王汎森、王贞平、陆扬等华人学者与崔瑞德多有交集，同为汉学巨擘的史景迁亦出自他的门下。史景迁高超的叙事手法与文字功底独树一帜，巧妙烘托出中国社会各项制度的复杂运作。曾与这对师徒有过较多接触的史景迁说：“史景迁治学以个人性为主，究竟高不可攀；但其师杜希德（即崔瑞德）的治学方略，按部就班，有迹可循，却造就人才不少。”史景迁与崔瑞德堪称西方汉学界绕不过去的高峰，前者肆意洒脱性情是与生俱来的幸运，但这份幸运并非每个人都能享有；而后的取径则能按图索骥，从技巧方法层面逐步深入，给人“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之厚重感。

汉学最先于19世纪末的欧洲兴起，步入20世纪，后来居上的美国逐渐在汉学领域占据一席之地。二战以来，北美彻底取代欧洲，领汉学风气之先。汉学典范转移的过程中，崔瑞德功不可没。他通过主编《剑桥中国史》《泰东》《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三者，延揽西方史学大家，发掘学界未曾扬名的学者，毕汉思、伊沛霞等如今声名煊赫的汉学家，大都在《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中推出专著，从而奠定自身的学术地位。

崔瑞德辞世后，他的藏书和手稿都被台湾傅斯年图书馆收藏，后者专设一室用以珍藏展示。崔瑞德虽已长眠，但这位汉学家的理念与贡献影响至深。



海外汉学家

（上接1版）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展现出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从“现代化的迟到国”跃升为“世界现代化的增长极”，实现了“弯道超车”，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以“中国之治”“风景这边独好”展现出现代化另一幅美丽图景。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摆脱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路径依赖，以其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为促进世界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方方案。

新时代十年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充分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科学性真理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

验，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实现了小康这个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世界第二位，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现实的成功是最好的理论，没有一种抽象的教条能够和它辩论。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在新时代的中国得到充分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新时代的中国得到充分检验。

厦门经济特区建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生动实践。20世纪80年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厦门工作了整整3年，为厦门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一系列理念创新和实践探索；到省里和中央工作后，始终关注关心厦门发展，多次对厦门的现代化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特别是在致厦门经济特区建设40周年贺信中专门赋予我们“努力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使命。40多年来，一茬茬特区建设者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厦门经济总量年均增长14.7%，财政总收入年均增长

18%，生态文明指数全国第一，连续六届荣获全国文明城市，共同富裕更加可感可享，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上的鲜活源泉和实践上的生动缩影。

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极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从历史经验中充分汲取智慧和力量，更加坚定自觉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之“矢”去射厦门高质量发展之“的”，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彰显厦门担当。

守正创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

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就是一个在继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的历史过程。面向未来，我们必须在守正创新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既坚守根本、培根固本，又探索试验、探路先行。

坚持好、运用好守正创新的重要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

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坚持守正创新是我们党成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经验，也是不断拓展和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还有许多未知领域。厦门努力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样面临许多困难挑战。只有守正，才能使我们的现代化之路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不变质、不偏向、不走样；只有创新，才能在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中立新潮、开新局、谋新篇。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必须把握好守正与创新的辩证关系，把坚定的原则性与高度的灵活性统一起来，以科学的态度、真理的精神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坚决守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和源、根和魂。守正是创新的基础和根本，就是在根本性方向性原则性问题上旗帜鲜明、毫不含糊，确保厦门在努力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坚定前行。必须坚守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首要原则，深刻领会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深刻把握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

贾湖骨笛，20世纪80年代出土于距今9000—7800年的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先后被挖掘出40余支，多为七孔，个别为二孔、五孔、六孔或八孔。贾湖骨笛不只是我国目前出土的年代最早的乐器实物，更被专家认定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乐器，它的出土是人类音乐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发现。作为史前音乐考古学的重大成果，贾湖骨笛对于中华民族音乐文明的起源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1987年5月14日，在M282号墓中发现两支骨笛，其中M282：20骨笛品相完美，是贾湖骨笛中的精品。1987年11月3日，相关专家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内首次对该骨笛进行测音工作，现场吹奏河北民歌《小白菜》，骨笛准确的高音和嘹亮的音色让在场的专家大为震惊，最后结论认为，“这支骨笛的音阶结构至少是六声音阶，也有可能是七声齐备的、古老的下微调音阶”。这一结论可谓石破天惊，因为一般认为中国的传统音乐是以五声音阶为主，西方音乐是以七声音阶为主，而贾湖骨笛的出现是否意味着生活在距今八九千年前的贾湖先民已经拥有了七声音阶的观念？如果这一结论成立，整个世界音乐史将被改写。除了这一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外，贾湖骨笛的身上还有诸多谜团。从材质上说，骨笛是用鹤类禽鸟的尺骨制作而成，故而声音清越。但这种尺骨的坚硬程度大致相当于人骨硬度的30倍，在如此坚硬的材质上排列着的音孔直径仅为0.1—0.3毫米，而且细致圆整，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贾湖先民们究竟用什么工具进行钻孔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他们究竟运用了什么算法来确定音孔的位置？他们如何在没有调音工具的情况下控制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这些未解之谜都值得我们去探究。贾湖先民在文明上所达到的高度极有可能超乎想象的。

贾湖骨笛发现以来，虽然进行了相关的测音工作，但研究成果缺乏突破性的进展，深度与高度都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这是因为出于文物保护考虑，文物管理部门及博物馆已禁止对骨笛直接进行吹奏测音研究。如何在保护文物的基础上开展深入的科学研究？这是亟待破解的难题。随着我国科技的快速进步，更多的先进技术被应用到考古研究中，这一难题逐渐找到解决方案。相关研究团队使用X光CT扫描、电脑建模、3D打印等技术对贾湖骨笛进行复制，已取得重大进展。他们首先运用CT技术对骨笛进行扫描，利用得到的数据在电脑上建立精准的三维立体模型，最后使用与骨笛材质尽可能接近的材料，采用紫外激光固化快速成形技术，制作出迄今为止精度最高的贾湖骨笛复制品。经过三维测量与测音实验，用本方法复制出的贾湖骨笛模型与实物在物理尺寸与音准上“几乎没有误差”。这种技术不仅可以制作复制品，而

且还可以运用到文物修复工作中，修复的文物将为相关的科研工作提供更多的研究样本和数据支撑。此项技术将帮助科研人员获得贾湖骨笛更为完整、丰富、全面的数据信息，从而进一步深化对贾湖骨笛在音律等方面的认知，逐步破解那些未解之谜，这是让人充满期待的！

也许，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贾湖骨笛的相关文创产品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当流淌而出的音乐萦绕在我们的耳畔，一定会引人遐想，使人沉醉。正如《如果国宝会说话》中说的那样，“穿行在骨笛孔洞之间的是九千年前人类的呼吸，那是文明的先声——那时风动，此时心动”。华夏初音，千年古乐，余韵流淌，绵延至今，这是贾湖骨笛创造的传奇，更是中华文明的无穷魅力！



从考古看文明

合发展实际、体现厦门特点的现代化路径。必须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上探索试验、探路先行，抢抓争取清单批量授权综合改革重大机遇，统筹推进国资国企、投融资体制、自贸试验区、营商环境等各领域改革，以更大格局、更高站位提升外循环层级、增强内循环动力，推动港口高质量发展，打造新发展格局节点城市。必须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探索试验、探路先行，大力实施科技创新引领工程、先进制造业倍增计划等，加快构建“4+4+6”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强主体、做大集群、做优生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必须在促进两岸融合发展上探索试验、探路先行，牢记服务祖国统一大业的特殊使命，积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加快打造两岸共同市场、共同产业、共同家园，全力打造两岸融合发展先行示范区。必须在实现共同富裕上探索试验、探路先行，纵深推进跨岛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持续提高居民收入，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加快打造共同富裕示范区。

（作者系福建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